

## 基督教激进改革派研究综述<sup>①</sup>

杨华明<sup>②</sup>

**内容提要：**本文对当代西方与汉语学界关于基督教激进改革派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总体考察与归纳。可以看到：激进改革派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成为西方基督教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迄今已取得丰富成果；而在汉语学界，激进改革派的相关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尽管进入21世纪后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专题性与深入度明显不足，理应受到学界的应有重视，成为汉语基督教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激进改革派；研究综述

###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Radical Reformation

**Abstract:** This essay has made a general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Radical Reformation in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academic field. From this literature review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western academia has gaine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realm of Radical Reformation research, while the Chinese academia still has a lot to do.

**Key Words:** Radical Reformation, literature review

---

① 本文是笔者社科基金项目“基督教激进改革派研究”（项目批准号19BZJ032）的阶段性成果。

② 杨华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激进改革派（Radical Reformation）研究是宗教改革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与激进改革派本身的特殊历史与特有神学有直接关系，也是中国基督教研究学界亟待全面深入展开的一个研究课题。

激进改革派在宗教改革历史上是遭受迫害、被边缘化的少数派，其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是指源自16世纪宗教改革中出现的再洗礼派运动的教派传统。从广义上讲，激进改革派是指信仰者教会或自由教会运动的教派传统，除了再洗礼派及其当代主要代表教派门诺会之外，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浸信会、兄弟会、循道宗、贵格会、五旬节派与敬虔派等都可归于这一传统。

对激进改革派的研究常常成为宗教改革史研究中无足轻重的内容。其主要原因有历史与思想两个向度。从历史上看：激进改革派的缘起在地域以及相应宗教文化背景上的多元性，导致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含混性，从而增加了研究难度；而激进改革派的信仰在特殊历史场景中只能通过口头、地下与方言的方式传播，这显然会导致相关历史资料的缺如与错谬。从思想上看，其参与者多为下层民众，与主流宗教改革派相比，缺乏神学素养高、影响力大的宗教领袖，因此研究的资料文本鲜有系统的神学论述，更多见诸零星神学思想、灵修日记甚至是刑讯记录，很难有相对集中的研究对象。

有鉴于此，西方关于激进改革派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西方传统的宗教改革史研究中，激进改革派要么被置于枝端末节的边缘地位，要么就是被主流教派研究者贬为“狂热分子”。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激进派中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革命实验才得到了积极的评价。恩格斯将再洗礼派称为“共产主义先驱”，认为闵采尔的政治经济纲领接近共产主义。到了20世纪中期，情况有了改观。“二战”后，自由教会运动的兴盛给激进改革派研究开创了契机，具有激进传统的各个小教派开始从自己的历史溯源中为自己寻求教派认同。而现代历史学的兴起更赋予该领域研究以新的研究方法论：传统仅重视历史主线

的宏观历史研究开始向微观的、底层的、民众的、边缘的视角转向,在宗教改革研究领域,激进改革派恰恰给史学研究提供了这一视角。由此,激进改革派研究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西方在激进改革派研究领域的进展,基本上走了一条从激进改革派(以再洗礼派为主要代表)自身讲述自己的历史故事、梳理自己的神学脉络、寻求自己的教派认同,到激进改革派成为宗教改革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的热点课题,再到激进改革派在当代基督教研究领域中找到自身定位、占有一席之地、并受到学界普遍认可与尊重的过程。作为宗教改革中的少数派群体,激进改革派在教会历史与神学研究领域一直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不利处境。进入20世纪中期,一些接受过系统神学训练的激进改革派神学家开始为自己的教派发声,尝试将自己特殊的教派历史与神学特色带入基督教研究领域。这其中的佼佼者 是哈罗德·本德尔(Harold Bender),他以《再洗礼派异象》(*The Anabaptist Vision*, 1944)<sup>①</sup>一书开创了激进改革派登上现代基督教学术舞台的道路。故可将本德尔视为当代激进改革派研究的鼻祖。本德尔视再洗礼主义为宗教改革的巅峰,一改激进派长期具有的“暴力革命”“末世狂热”的负面形象,并尝试挖掘再洗礼主义的思想精髓,明确提出了再洗礼主义的三个基本主题:“做门徒”(discipleship)的基督教伦理;“共同体”(community)的教会论;不抵抗的和平主义(pacifism),为后人研究以再洗礼主义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之历史与思想奠定了基调。本德尔的论述凸显了再洗礼派异于其他宗教改革派别的特点,彰显出激进改革派独有的伦理观,从根本上矫正了传统上关于激进改革派的负面认识。紧随本德尔之后,罗伯特·弗里德曼(Robert Friedmann)推进了激进派的神学研究深度,他在《再洗礼派神学》(*The Theology of Anabaptism*, 1973)<sup>②</sup>一书中指出,一向因缺乏系统理论而遭诟病的激进派神学,恰恰是因

① Harold Bender, *The Anabaptist Vision*, Herald Press, 1944.

② Robert Friedmann, *The Theology of Anabaptism*, Herald Press, 1973.

为没有受到传统神学体系的桎梏而具有特殊的活力，他将神学做了“显神学”与“隐神学”的区分，指出再洗礼主义是凸显了耶稣精神的隐神学，是真正回到根源（即“激进”的原初含义）的基督教思想。沃尔特·克拉森（Walter Klaassen）在本德尔思想的激励下出版了《再洗礼主义，既非天主教，亦非新教》（*Anabaptism: Neither Catholic Nor Protestant*, 1973）<sup>①</sup>将再洗礼派群体明确界定为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不同于天主教与主流改革派的第三个派别。

激进改革派在西方基督教研究领域的发声，引起了学界对宗教改革中这一个特殊群体的关注。学界意识到，激进改革派在宗教改革历史中以及后来基督教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显然被忽视了。当西方学界在宗教改革整体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广度、高度与深度的时刻，在教会群体中处于边缘、在研究领域不受重视的激进改革派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激进宗教改革》（*The Radical Reformation*, 1962）<sup>②</sup>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基督教学界正式认可了激进派在宗教改革中的应有位置，该书讲述了位于宗教改革边缘地带的诸多激进派相互间内在关联的历史。威廉姆斯突破了将激进派等同于再洗礼派的狭义界定，同时将唯灵论派（Spiritualism）与福音理性派（Evangelical Rationalism）划入激进派一列。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界对激进改革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起源与定位两个问题上。关于激进改革派的起源，学界有“同源发生论”与“多源发生论”的分歧。包括本德尔在内的早期激进派研究学界将激进派的起源归于最早与茨温利等主流改革派相决裂的瑞士再洗礼派，认为该派在1527年形成的《施莱特海姆信纲》是确立激进派关于成人洗礼、与世界相分离以及和平主义立场的纲领性文献。但后来的更多学者意识到瑞士、德奥及荷兰等地的激进派因地域

① Walter Klaassen, *Anabaptism: Neither Catholic Nor Protestant*, Conrad Press, 1973.

② George H. Williams, *The Radical Reformation*, Westminster Press, 1962.

民族特质、宗教文化语境及领袖人物个人情况等因素的差异而呈现出各自的特色。除了瑞士的“福音理性派”，德奥地区以胡特、胡特尔为代表的“唯灵论派”和荷兰从明斯特激进革命向门诺会和平主义转变的“激进的和平主义派别”都是激进改革派的渊源。因此，不可将激进改革派的历史缘起归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位或几位领袖人物、某一种神学思想和历史思潮的驱动，这个独特的基督教派别并没有单一的“规范性”发源地，而只能用“描述性”方式讲述其诞生过程。正如沃尔纳·帕库尔（Werner Packull）等人所持观点：再洗礼派的历史缘起并非“一源发生论”的，而毋宁是一种“多源发生论”。

关于对激进改革派在宗教改革史上的定位，西方学界最初受恩格斯对德国闵采尔农民战争评价的影响，将激进改革派简单归结为“宗教改革的左翼”（Roland H. Bainton言）、“宗教改革的布尔什维克”（Preserved Smith）。本德尔和弗里德曼基于自己的教派认同，强调了再洗礼派作为不同于新教主流派别的特殊性，将再洗礼派称为居于罗马公教会与新教主流派别之间的“中间道路”，是第三种选择。基督教学界对这一界定表示认同，提出激进派改革是与主流宗教改革、或称“威权式”（magisterial）改革与公教会反宗教改革运动并行的另一种运动，是第三类改革。

伴随激进改革派研究成为西方基督教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有更多杰出的激进改革派神学家登上当代基督教舞台。他们让独具特色的激进派运动与思想走出了原有的“小教派”界限与边缘化处境，在基督教研究领域有了既彰显教派特质、又超越教派限制的崭新定位。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门诺会的约翰·哈沃德·尤德尔（John Howard Yoder，或译作尤达）、托马斯·芬格（Thoma Finger）、丹尼·维沃（Denny Weaver）、阿诺德·施耐德（C. Arnold Snyder），循道宗的斯坦利·哈沃瓦斯（Stanley Hauerwas）以及浸信会的詹姆斯·麦克伦登（James Wm. McClendon）等人。芬格的《当代再洗

礼派神学》( *A Contemporary Anabaptist Theology*, 2004 )<sup>①</sup>、维沃的《再洗礼派的形成》( *Becoming Anabaptist*, 2005 )<sup>②</sup>、施耐德的《再洗礼派历史与神学》( *Anabaptist History and Theology*, 1995 )<sup>③</sup>与《追随基督脚步——再洗礼派传统研究》(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Christ: The Anabaptist Tradition*, 2004 )<sup>④</sup>以及威廉·艾斯特普( William R. Estep )的《再洗礼派历史：16世纪再洗礼主义简介》( *The Anabaptist 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Sixteenth-century Anabaptism*, 1996 )<sup>⑤</sup>等著作，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再洗礼派传统的历史溯源与神学归纳。若说这几位门诺会神学家是在狭义层面上(即再洗礼派传统)推进了激进改革派研究，那么循道宗激进派学者麦克伦登就是在广义层面上阐释了激进改革派思想的基本视域：《圣经》故事就是基督徒自己的生命叙事，传教使命是基督徒的责任，自由是无需国家支持或阻碍的自由地顺服上帝，做门徒是进入顺服于耶稣主权的生命，而共同体是在日常生活中与人分享这种视域。

出身门诺会的尤德尔堪称当代激进改革派的首席神学家，他在激进改革派的历史与神学研究方面都颇有建树。他的《瑞士的再洗礼主义与宗教改革》( *Anabaptism and Reformation in Switzerland*, 2004 )<sup>⑥</sup>一书对再洗礼派的早期历史及其与主流改革派的关系问题做了深入剖析与解读；其《神学序言》( *Preface to Theology*, 2002 )<sup>⑦</sup>一书基于《新约》解读发展出一种独具激进改革派特色的基督论；而让整个神学界都开始关注到以再洗礼派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思想的

① Thomas N. Finger, *A Contemporary Anabaptist Theology*, Inter Varsity Press, 2004.

② J. Denny Weaver, *Becoming Anabaptist: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Sixteenth-Century Anabaptism*, Second Edition, Herald Press, 2005.

③ C. Arnold Snyder, *Anabaptist History and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Pandora Press, 1995.

④ C. Arnold Snyder,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Christ: The Anabaptist Tradition*, Orbis Books, 2004.

⑤ William R. Estep, *The Anabaptist 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Sixteenth-century Anabaptism*, Grad Rapids: Eerdmans, 1996.

⑥ John Howard Yoder, *Anabaptism and Reformation in Switzerland: A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Anabaptists and Reformers*, Pandora Press, 2004.

⑦ John Howard Yoder, *Preface to Theology: Christology and Theological Method*, Brazos Press, 2002.

著作是尤德尔的代表作《耶稣政治》( *The Politics of Jesus*, 1972 )<sup>①</sup>。《耶稣政治》一书突破了原有西方激进改革派的研究领域, 经过本德尔等激进改革派先驱为该领域研究奠定基调, 威廉姆斯等激进改革派研究者对激进改革派进行学术界定、历史探源与定位分析, 尤德尔的思想让激进改革派作为独立且独特的角色登上了基督教研究的舞台。尤德尔在《耶稣政治》一书, 用《新约》释经的方式阐释出一种激进基督教伦理观, 表达了“反君士坦丁主义”的激进派自由教会立场与激进派和平主义的主张, 向当时以尼布尔思想为代表的主流基督教伦理观提出了挑战, 在基督教思想界引起相当反响, 堪称当代基督教伦理学思想的一本名著。

美国当代基督教伦理学家哈沃瓦斯继承了尤德尔反君士坦丁主义思想的衣钵。出身循道宗的哈沃瓦斯也是激进改革派的当代领军人物, 他在《侨居者》( *Resident Aliens*, 1989 )<sup>②</sup>与《基督教王国之后》( *After Christendom*, 1991 )<sup>③</sup>等著作中提出了“教会作为城邦”( *church as polis* )的思想, 在反君士坦丁主义的立场上与尤德尔的“耶稣政治”前后呼应。

此外, 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将尤德尔、哈沃瓦斯等激进派神学家与主流教派神学家进行了个案比较研究, 如安纳·拉斯姆森( Arne Rasmusson )在《教会作为城邦》( *The Church as Polis* )<sup>④</sup>一书中对哈沃瓦斯的神学政治与当代改革宗著名神学家莫尔特曼( Jürgen Moltmann )的政治神学做了剖析与比较, 尼格尔·莱特( Nigel Goring Wright )在《否认君士坦丁》( *Disavowing*

---

① John Howard Yoder, *The Politics of Jesu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2.

② Stanley Hauerwas and William H.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 Abingdon Press, 1989.

③ Stanley Hauerwas, *After Christendom*, Nashville, 1991.

④ Arne Rasmusson, *The Church as Polis: From Political Theology to Theological Politics as Exemplified by Jürgen Moltmann and Stanley Hauerwa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4.

*Constantine*)<sup>①</sup>一书从反君士坦丁主义问题出发比较了尤德尔和莫尔特曼的神学。这些著作都反应出激进改革派思想堪当对话主流基督教思想的重任。而莫尔特曼本人也对激进改革派的“做门徒”伦理有浓厚的兴趣,与多名当代再洗礼派神学家展开了积极对话,并出版了《门徒政治与政治门徒》(*The Politics of Discipleship and Discipleship in Politics*, 2006)<sup>②</sup>一书,成为研究基督教主流派别与激进改革派当代对话实践的重要著作。

通过梳理当代西方基督教学界在激进改革派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可以看到,自20世纪中期以来,经过几代包含激进改革派人士在内的基督教研究者的努力,对激进改革派运动的历史缘起、神学特色、角色定位、当代影响以及未来走向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不俗成就,在激进派历史、神学及激进派个案神学家研究等方面皆有很大进展,虽然该领域研究还不至于称为“显学”,但绝对是宗教改革历史研究、基督教派研究、基督教和平主义研究、当代西方政教关系研究等诸多学术领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比于之前边缘化、少数派的处境,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相比于西方研究的成果,国内在激进改革派方面的研究成果显然薄弱得多。学界研究重心无疑在宗教改革主流改革派之上。近年来,汉语基督教研究学界在宗教改革研究方面的成果层出不穷,尤其是借宗教改革五百年特殊历史时刻的东风,在宗教改革的历史、思想及其当代遗产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在激进改革派的研究方面成果依然是屈指可数的情况。在一些基督教史或宗教改革史相关的著作或译著中会有论及激进改革的章节,不过往往着墨不多、一笔带过。值得提出的是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的《改教家的神学思想》

① Nigel Goring Wright, *Disavowing Constantine: Mission, Church,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he Theologies of John Howard Yoder and Jürgen Moltmann*,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0.

② Jürgen Moltmann, Edited by Willard M. Swartley, *The Politics of Discipleship and Discipleship in Politics: Jürgen Moltmann Lectures in Dialogue with Mennonite Scholars*, Cascade Books, 2006.

(*Theology of the Reformers*) 的中文译本<sup>①</sup>, 该书有专门一章《别无根基: 门诺·西门》是介绍再洗礼派门诺会创始人门诺·西门的, 涉及到激进宗教改革、再洗礼派、门诺会的基本历史与神学主张, 是汉语读者了解激进改革派入门级读物。尤德尔基督教和平主义理论的著作《非暴力简史——华沙演讲录》的中文译本业已出版,<sup>②</sup> 为汉语读者基督教和平主义思想提供了独特的激进改革派的视角。此外, 笔者正在翻译尤德尔的成名作《耶稣政治》<sup>③</sup> 一书, 这部代表当代再洗礼主义最高学术成果的研究性著作, 将会让汉语读者近距离了解激进改革派的伦理主张与和平主义诉求。

汉语学界在激进改革派领域的专著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据笔者了解仅有一部相关专著, 即赵文娟的《侯活士品格伦理与赵紫宸人格伦理的批判性比较》(2016)<sup>④</sup>, 该著作是汉语学界关于当代激进改革派神学家哈沃瓦斯(作者译为侯活士)伦理学的系统性研究, 论及哈沃瓦斯具有激进色彩的基督教伦理观及其“反君士坦丁主义”的观点。

汉语学界研究激进改革派的学术论文篇目同样寥寥无几。就笔者查阅到的文献, 20 世纪仅有两篇文章, 分别为王松亭的《试论再洗礼派》(1988)<sup>⑤</sup> 和孙立新的《再洗礼运动与“激进派宗教改革”》(1994)<sup>⑥</sup>。从这两篇文章来看, 早期相关主题的研究重心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切入, 对激进改革派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革命运动进行介绍与分析, 需要指出, 孙立新一文对 20 世纪西方史学界关于激进派宗教改革的界定进行了学术史的综述与梳理, 并将之与马克思

① [美] 蒂莫西·乔治著, 王丽译:《改教家的神学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美] 约翰·霍华德·尤达著, 张鹤译, 李天伟校:《非暴力简史——华沙演讲录》, 上海: 三联书店, 2020 年版。

③ [美] 约翰·霍华德·尤达著, 杨华明译:《耶稣政治》, 上海三联书店(待出版)。

④ 赵文娟:《侯活士品格伦理与赵紫宸人格伦理的批判性比较》,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16 年。

⑤ 王松亭:《试论再洗礼派》, 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 年第 2 期。

⑥ 孙立新:《再洗礼运动与“激进派宗教改革”》, 载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年第 2 期。

主义史学观对激进派宗教改革的认识进行了比较分析，堪称国内激进改革派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

进入21世纪情况有所好转，笔者查阅到的学术论文如下：贺相铸、杨林伟的《再洗礼派社会学思想分析》（2008）<sup>①</sup>，王建的《20世纪后期国外激进宗教改革研究综述》（2014）<sup>②</sup>与《20世纪后期国外再洗礼派研究中的影响因素及新路径探析》（2015）<sup>③</sup>，刘甜甜的《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明斯特公社》（2016）<sup>④</sup>、《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摩拉维亚公社》（2016）<sup>⑤</sup>与《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激进改革运动》（2017）<sup>⑥</sup>。王建的两篇文章是关于20世纪后期西方激进改革派研究的综述性论文，给读者介绍了当代西方相关研究的主要成果与相关方法论，给国内在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提纲挈领式的参考文献。《20世纪后期国外激进宗教改革研究综述》一文，对再洗礼派三大问题的争论：起源问题、思想渊源问题以及本质问题逐一展开评介，对西方自1960年代自威廉姆斯《激进宗教改革》一书问世后的激进宗教改革研究的基本发展状况做了全面介绍与分析。《20世纪后期国外再洗礼派研究中的影响因素及新路径探析》一文论述了社会史研究方法在当代激进改革派研究中的积极影响，并指出这一方法有效避免了因教派立场或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在该研究领域带来的争议。刘甜甜的三篇文章是对激进派宗教改革历史的具体探究，对激进派尝试建立的明斯特公社与摩拉维亚公社的历史进行评介，展示出一幅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视野下的激进宗教改革的历史画面。

① 贺相铸、杨林伟：《再洗礼派社会学思想分析》，载于《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② 王建：《20世纪后期国外激进宗教改革研究综述》，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5期。

③ 王建：《20世纪后期国外再洗礼派研究中的影响因素及新路径探析》，载于《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④ 刘甜甜：《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明斯特公社》，载于《东岳论丛》，2016年第5期。

⑤ 刘甜甜：《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摩拉维亚公社》，载于《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

⑥ 刘甜甜：《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激进改革运动》，载于《学术界》，2017年第8期。

上述相关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在史学层面展开的研究,以综述性、介绍性的论文形式成果为主。可以看到,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在激进改革派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该研究主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重点研究方向,但仍不可否认该领域研究成果数量较少的现实状况,仍然缺少全面介绍激进派宗教改革历史、深入分析激进改革派神学思想、进而探究激进改革派当代意义的专著研究。近年来,关于再洗礼派历史与思想的深入研究已有了初步进展,关于当代激进改革派神学家尤德尔、哈沃瓦斯、本德尔等人的思想研究都已初见成果,包括姚西伊关于激进改革派研究开山鼻祖本德尔及其代表作《再洗礼派的异象》述评的论文:《哈罗德·班德尔与“再洗礼派的异象”》(2019)<sup>①</sup>,给读者介绍了本德尔关于再洗礼主义的界定及其对再洗礼主义基本特征的归纳。此外,笔者本人在激进改革派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初步成果,包括《尤德尔的和平主义神学简介》(2014)<sup>②</sup>、《反君士坦丁主义:哈沃瓦斯的激进改革派神学》(2019)<sup>③</sup>、《再洗礼派历史溯源》(2017)<sup>④</sup>等学术论文,都是对激进改革派历史、思想以及当代西方代表性神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的尝试性研究。《再洗礼派历史溯源》一文通过对16世纪再洗礼派在瑞士、德国与荷兰等地产生与发展的考察,分析了再洗礼主义所倡导的和平主义、反君士坦丁主义的政教分离思想、“神化”救赎论以及“做门徒”的伦理观等思想的历史渊源,从而挖掘出再洗礼派如何以自己特有的少数派观点在基督教思想史上产生积极影响的。本文给汉语读者提供了一个激进改革派的基本历史视野。《尤德尔的和平主义神学简介》一文,通过对尤德尔的基本生平、再洗礼派历史与神学概况以及尤德尔的代表作《耶稣政治》一书的评介,论述了脱胎于激进改革派反君士坦丁主

① 姚西伊:《哈罗德·班德尔与“再洗礼派的异象”》,载于《福音与当代中国》第六期,2019年10月。

② 杨华明:《尤德尔的和平主义神学简介》,载于《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5期。

③ 杨华明:《反君士坦丁主义:哈沃瓦斯的激进改革派神学》,载于《基督宗教研究》第25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年。

④ 杨华明:《再洗礼派历史溯源》,载于《基督宗教研究》第22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

义思想的尤德尔的和平主义神学，以“顺服”“革命”“合一”与“终末”为基本元素构建而成。本文是对激进改革派和平主义神学的深入剖析。《反君士坦丁主义：哈沃瓦斯的激进改革派神学》一文基于对“激进改革派”与“君士坦丁主义”概念的界定，介绍了哈沃瓦斯由叙事“品格”伦理学、“教会作为城邦”的神学政治与基督教和平主义思想共同构成的激进改革派神学，向汉语读者介绍了哈沃瓦斯反君士坦丁主义的观点。

此外，笔者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2019年申报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督教激进改革派研究》，旨在超出国内学界在该领域停留在历史性、介绍性与综述式研究的层面，兼顾历史与思想、两全过去与当下，以期填补国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激进改革派研究不应仅是宗教改革史上一个可有可无的次要章节，更不应只是在史学层面上的介绍与理解，而应成为宗教研究领域、基督教历史与神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激进改革派在宗教改革进程中留下的独特、丰富、多元的历史经验与文化遗产，其不同于主流改革派的神学价值取向，其当代主要神学家的重要思想及其影响，都将是本课题涉及的内容。